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Peter J. Katzenstei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权力与财富之间

[美] 彼得·J. 卡岑斯坦 编/陈刚 译

权力与财富之间

[美] 彼得·J. 卡岑斯坦 编/陈刚 译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62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财富之间 / (美) 卡岑斯坦 (Katzenstein, P.) 著;
陈刚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12
(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书名原文: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ISBN 978-7-80720-791-7

I. 权… II. ①卡…②陈… III. ①比较政治学②比较
经济学 IV. D0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495 号

书 名: 权力与财富之间
作 者: 卡岑斯坦
译 者: 陈 刚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杨 洋
装帧设计: SDDoffice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27.25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20-791-7
定 价: 3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国际编委会

Ha-Joon Chang(剑桥大学经济学院)

Peter Evan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Peter Gourevitch(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Stephan Haggar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

Peter Hall(哈佛大学政府系)

David C. Kang(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

Peter Katzenstein(康乃尔大学政府系)

Michael Man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

Atul Kohli(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Margaret Levi(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Mathews(麦考瑞大学管理学院)

Joel Migdal(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

Gregory Noble(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Ove Pedersen(哥本哈根商学院商业与政治国际中心)

Adam Przeworski(纽约大学政治学系)

Herman M. Schwartz(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

Linda Weiss(悉尼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

Meredith Jung-En Woo(密西根大学政治科学系)

John Zysma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科学系)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 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 2006 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吉林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 1965 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

同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 70 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

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即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著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以及杨洋女士的具体联系工作。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 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 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础。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

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视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据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转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实

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作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中文版序

彼得·J. 卡岑斯坦

各种形态的现代资本主义都融合于政治妥协。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将极端政治拉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虽然国有化(二战后)与私有化(冷战后)截然不同,但它们作为政治工程的目标都是这样的妥协。其他一系列的规制与反规制政策——包括经济计划、收入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支持以及供给方政策等——也都一样,它们被证明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力和政治合法性的关键。

当对比较资本主义的系统学术分析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为激动人心的学术领域时,人们既看不到也想不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当时的理论主流——多元主义政治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流派——都试图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中心趋势和概括性趋势。受到像安德烈·肖恩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的《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 年版)这类少量著作的刺激,《权力与财富之间(Between Power and Plenty)》一书的目的是修正当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趋势。它为制度形式的结构性分析奠定了基础。这类分析属于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传统,聚焦于国家、社会和经济的互动,并试图发展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途径。这个研究途径不使任何一个类别具体化——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阶级,而是致力于在具体环境内确定不同模式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而得出有关不同资本主义类型的有限推论,无论是自由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还是统合主义类型或国家主义类型。30 年之后的今天,这种分析风格仍然很有用,例如用于研究协作型和非协

作型市场经济,更精确地说就是,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制度动力的确认。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崛起也很容易在这个学术视角内理解:即30年来改变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型国家的一种特殊形态。

《权力与财富之间》还有第二个激发起来的灵感,同样反映在现代中国的崛起之上。这本书试图将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连接起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政治实体的国内特点在传统上被认为无关紧要。国家与国内政治被当作黑箱,因为学者们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国家是单一的、有目的的行为者这样的假设之上。虽然这个假设能够带来简洁的分析,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它是无法在学术上得到维护的。20世纪90年代在安全事务研究上的建构主义转向打破了不同的分析层次,而这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好几十年前就实现了。《权力与财富之间》是这方面几部早期著作之一,它指出了不同国内政治力量在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演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今天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分析焦点于很多不同政治维度中的国际和国内的紧密联系。这是30年前那个学术动作的延续,它否定将研究局限于任何一个分析层次。中国选择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和进口国外技术来迎合全球化的动态就是对融合国际、国内事务的一个有力展示。

制度结构性分析(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ve analysis)以及国际、国内分析层次的明显联系是《权力与财富之间》通过坚持将政治放在分析首位而连接起来的两个学术动作。这可以通过比较优势概念的转化来说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内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如果国家注重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会为其带来最大收益。但是,比较优势概念是静态的,就像许多批评者如李斯特指出的那样。根据李嘉图的著名例子,1780年葡萄牙专门生产酒,英国专门生产服装。到了1880年,葡萄牙仍然出口酒,英国则出口重机械。最后到1980年的时候,葡萄牙继续出口酒,而英国已经出口电脑芯片了。比较优势冻结了一系列由市场词汇表达的政治关系,并宣扬那种造成累积国家经济差异的政策。因此

它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抱负的打击特别沉重。

在过去的 30 年里,政治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对“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概念的明确政治解释,从而挑战了比较优势的传统概念。竞争优势并不假设固定的资源禀赋(葡萄牙的阳光,英国的资本等)。相反,它假设所有地方的国家经济(national economies)都争取使自己的资本藏量增加、劳工技术提升、科技在新一代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更好地应用。这个经济生活的动态概念抓住了政治在现代世界中塑造经济选择的精髓,并展示了政治如何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

东亚发展型资本主义精确地预示了经济生活的这种政治概念。日本没有满足于专门生产轻型耐用消费品,而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走上了重工业建设之路,特别是钢铁业和造船业,这成为它在六七十年代全球造船业以及汽车产业获得成功的基础。在 70 年代初但于 1973 年的石油危机之前,日本政策制定者宣布,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已不可避免。日本在电子消费品、家用电脑和大型电脑、芯片以及电讯等产业上惊人的进步使其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日本用了 40 年打造的成功事业,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以及现在的中国已经或正在用更短的时间完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性和全球性动力的基础,政治在比较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显示出竞争优势概念的特殊位置。《权力与财富之间》坚持指出政治在现代资本主义演变中的首要作用。我认为没有比中国的改革更能展示这个基本观点的案例了。

社会科学发展出不同的研究途径完成比较分析的任务,不仅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些研究途径突出相似点,有些则注重独特性。例如,对选举行为感兴趣政治科学家倾向于强调各大众选举系统以及正规选举竞争系统的基本相似性。同样,许多社会学家聚焦于工业或后工业社会的结构相似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分别认同,国家经济应从市场竞争或生产工具私有制的角度来看待。

与之相反,人类学家则强调国家文化作为某一具体历史发展结果的独特性。这类解释的普及版本可以经常在经济刊物的通俗文章中找

到,例如用文化的观点解释中欧国家(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经济成功,认为中欧人是活着为了工作,而不是工作为了活着。与其相似,日本、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东南亚国家以及现在的中国和越南的超级经济表现可以用所谓的“亚洲蚂蚁理论(Asian Ant Theory)”来解释。亚洲人过分的服从精神以及努力工作精神使其擅长于完成非常具体的任务。这些文化解释的普及版都是典型的本质主义、种族中心主义观点,而且都是错误的倾向。从国际标准来看,德国人的工作时间很短。而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东亚人也在不少高技术产业里获得重大突破。但是,无论这些版本多么错误,它们都与成熟的人类学视角有相似之处。比较不同民族文化的含义与传统的网络就是要突出这些民族文化的独特元素。这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自从《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出版以来,它所展示的比较制度研究途径(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pproach)一直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演化。这个研究途径将突出相似性的分析和重视独特性的视角结合起来。相似性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建筑材料”——例如企业与工人、商业协会与劳工运动、银行、官僚机构以及政党等。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政治世界的任何地方找到这些基本建筑材料。但是,不同国家的历史又创造了具有特色的而不是独特的国家结构。随着中国在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等各个传统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它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鲜明案例。

对于那些不同国家模式的一个公认解释可以在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著的《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论文集(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克纳普出版社,1962年版)一书中找到。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需要资本动员,而资本需求量以及资本动员速度在像日本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里比像英国这样的先发展国家要大得多、快得多。英国的工业化与纺织革命相伴而生,创造了大量的机械化纺织企业,而它们并不需要动员大量资本用以开始生产。另外,这

些企业实际上也没有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日本工业化出现得很晚。出现时,钢铁、铁路和工程产业已决定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前沿。大量资本需要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动员起来。日本企业同时还必须面对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格申克龙的理论提出,工业化的时间与特征引发资本主义的特色国家模式。与 20 世纪的英国国家结构相比,日本的国家结构很强大。它帮助大规模的资本动员,同时还要保护日本生产者。英国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的不同制度结构——如伦敦商业银行与日本企业组织(财团)的不同——可以被格申克龙的理论所解释。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里,这些不同的制度结构在对二战后英日政治经济分析中得到了突出的展示。

对英国和日本的讨论说明了一个更具概括性的观点。英国和日本的经历代表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极,它们都服务于以历史为基础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途径。格申克龙以外的其他理论家们采取了类似的逻辑回答其他问题,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美国 and 英国的比较,伯灵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分析,以及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关于美英与日德的比较,都含有一个地理维度,从西方伸展至东方。但这些分析也含有一个年代次序维度,将走上民主道路且无战争创伤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区别于经历过重大国家创伤的权威主义后发展国家。

格申克龙的解释是通过近距离分析 19 世纪欧洲经济史得出的。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在 21 世纪初的经济崛起建立在任何过时的欧洲经验之上。但是基于《权力与财富之间》一书所提出的研究途径,也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崛起是独特的,超出了比较性和制度性分析。将中国放在更广阔的学术框架里,并分析中国的经验怎样帮助我们重整这些框架,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新一代学者的一个愉快的学术任务。

2007 年 12 月

纽约伊萨卡

序 言

这本论文集分析的是发达工业国家的国内结构如何塑造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政治战略。论文早先的提纲和草稿是为1976年2月多伦多国际研究协会年会的一个专题研究小组和1976年1月康奈尔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涉及国内结构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而准备的。根据上述讨论,这些论文在发表前作了不止一次的重大修改。

从一开始,这就是协作的成果。作者们所作出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其各自的论文所能有的贡献。导论和结论这两篇论文中的观点包含了我们讨论中的许多中心主题。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莫林·艾波·莫洛特(Maureen Appel Molot)以及希伯来大学的加布里埃尔·谢菲尔(Gabriel Sheffer)也是核心小组的成员。在哈佛的研讨会上他们准备了论述加拿大和以色列对外经济政策的极好论文。不幸的是,这两篇论文没能收录在这本论文集之中,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篇幅太长了。

所有这些论文都极大地得益于前述专题研究小组和学术研讨会参与者的批评和建议,他们是:道格拉斯·阿什福德(Douglas Ashford)、斯蒂芬·柯亨(Stephen Cohen)、马可·德斯特勒(Mack Destler)、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特德·格林伍德(Ted Greenwood)、芭芭拉·哈斯克尔(Barbara Haskel)、罗伯特·艾萨克(Rob-

ert Isaak)、迈尔斯·凯勒(Miles Kahler)、加内特·凯利(Janet Kelly)、詹姆斯·库尔斯(James Kurth)、彼得·朗格(Peter Lange)、卡尔·兰科斯基(Carl Lankowski)、米尔顿·莱滕贝格尔(Milton Leitenberg)、查尔斯·里普森(Charles Lipson)、弗兰克·朗(Frank Long)、伊恩·拉斯提克(Ian Lustick)、约翰·奥代尔(John Odell)、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罗伯特·帕斯托(Robert Pastor)、乔治·奎斯特(George Quester)、朱蒂斯·雷皮(Judith Reppy)、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琼·斯佩罗(Joan Spero)、西得尼·塔罗(Sidney Tarrow)、以斯拉·沃格尔(Ezra Vogel)、斯蒂芬·瓦内克(Steven Warnecke)和彼得·韦茨(Peter Weitz)。

在1976年夏天,《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编辑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向我提出说这份期刊有兴趣将这些修改后的研讨会论文作为专刊发表。他对这项研究计划的兴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他的努力下,由本杰明·柯亨(Benjamin Cohen)、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组成的一个评审委员会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每篇论文,并且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

尼科尔·博尔(Nicole Ball)、琳达·拉宾(Linda Rabben)和裘·邓海姆(Jo Denham)是对内容和文风感觉敏锐的编辑。

与这本论文集所得到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智识帮助相伴,财政的支撑也是很重要的。获得的资金来自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研究计划、哈佛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平研究计划、卡彭特讲座教授基金以及康奈尔大学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计划。